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集刊·

农村·经济·社会



1981 年卷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集刊》

农村·经济·社会

一九八一年卷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

编 者 的 话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0年9月组建，1981年2月正式成立。近两年来，我们在党的关怀下，在老一辈革命家和前辈学者的支持和帮助下，与一些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开始作了一些社会科学系统研究的尝试。

社会科学中的多学科系统研究，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为了向广大关心农村发展的同志们学习，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我们将自己在研究中的点滴体会和想法，选编出来提供给大家。这里收入的文章，往往不仅使用了不同学科的方法和语言规范，而且可能在一些内容和观点上也不尽一致，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教。

本书共编入50余篇文章，分为“工作研究”、“调查研究”、“专题研究”和“理论方法”四个部分。其中有的在报刊发表过，多数则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还有一些未编入本书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文章，因篇幅有限，我们以《其它研究成果选目》的形式附在书后，为有兴趣的同志提供一个线索。

今后，我们准备将研究成果分年度陆续编辑成卷。本书是我们1981年度的文章选编。因为是第一卷，所以也收入了若干篇1980年的文章。

本书的编辑出版，曾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农村·经济·社会》编辑小组
1982年12月

参加本卷编辑工作的有：陈一谔、王小强、杜鹰、白若冰、谢扬、

丁晓聪、左思、董迎、李海春等同志。

目 录

代序 认清国情, 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1)
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	邓力群 (5)
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	杜润生 (12)

一、工 作 研 究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计划的总体构想.....	筹备小组 (16)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工作的初步构想.....	方法组 (22)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计划提纲 (草案)	秘书组 (33)
附录: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第一阶段合同.....	(35)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第一阶段的工作意见.....	综合组 (37)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方案的初步设想.....	理论历史组 (42)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经济社会调查提纲和表式的初步设想.....	现状组 (47)

二、调 查 研 究

农村的曙光 中国的希望

——关于安徽省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	陈一咨 (96)
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	
——关于甘肃省包产到户问题的考察报告.....	陆学艺 王小强 (117)
为什么“富裕”公社也搞了包产到户?	
——安徽省宣城县水阳公社调查.....	陈一咨 (132)
当前农村发展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137)
关于农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王耕今 (142)
“双包到户”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	
——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调查综合报告.....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146)
“双包到户”后的粮食生产前景问题	
——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 (一)	邓英淘 张阿妹 (167)
“双包到户”后农村社会的贫富问题	
——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 (二)	白南风 邓永思 (174)
“双包到户”后的劳动力和资金变动趋势	
——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 (三)	白南生 徐宽 赵明宇 (191)
“双包到户”后的协作与联合问题	
——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 (四)	张木生 杜鹰 谢扬 (218)

“双包到户”后农村基层单位经济职能的变化和公社体制改革	
——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五)	周其仁 王小强(229)
怎样看待包干到户	
——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六)	杨勋 孙方明(235)
巨大的变化 深刻的启示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雁塘头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典型调查	
.....	陈锡文 马苏元(240)
先进队为什么也搞起了包产到户?	
——安徽省全椒县老观陈大队包产到户的典型调查	杨冠三(246)
从“炮打不散”到包产到户	
——安徽省来安县大余郢生产队生产组织形式演变的典型调查	梁晓东(251)
上海郊区农村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调查	曾亚强 袁崇法(260)
关于稻麦三熟制的几个问题	
——上海郊区和苏南地区农村调查	王耕今(267)
“农民卖粮难”的问题急待解决	陈一咨(271)
四川柑桔为什么大批腐烂	王晓鲁 陈一咨 孟繁华 白若冰(275)
干果产区的粮食政策急待调整	
——北京市怀柔县黄坎公社调查	孙 明(281)
在稳步发展中逐步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	
——山东省济南、青岛两市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的调查	朱嘉明执笔(284)

三、专 题 研 究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改变农业落后面貌	杨 勋(292)
论包产到户	
——一个重要的理论政策问题	杨 勋(301)
包产到户所体现的经济原则和	
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	王小强、周其仁(309)
实行“双包到户”后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陈一咨 王小强(324)
包干到户与集体经济	
——兼谈责任制的其它形式	王子平(327)
论农村的联产承包制	陈一咨 王小强 谢扬(333)
生态平衡和农业发展	王耕今(340)
生态平衡与农业现代化	梅兴保(346)
论社队企业	徐宽 沈晓莉 孙方明(355)
试论农村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的调整原则	刘惠勇(361)
三十年来我国需求大于供给趋势的初步探讨	黄江南(364)
关于适度积累率的几个问题	刘惠勇(371)
广东省经济发展模式初探	黄江南 王岐山 翁永曦 朱嘉明(378)

四、理 论 方 法

论战略研究·····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386)
论文明研究·····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396)
试从信息流角度考察分配的形式·····	白南生 (411)
农村税收及其它劳动扣除与择优分配·····	宋国青 (419)
价值规律研究·····	白若冰 (429)
所有权与商品交换·····	刘佑成 王晓鲁 (439)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价值实现的几个问题·····	白若冰 (446)
我国近代大机器生产的若干特点和传统·····	周其仁 (453)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粮食生产效率和水平·····	文洁 高山 (462)
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和农村经济结构·····	高王凌 (474)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刘 昶 (488)
外向的学习和研究方法·····	白南生 (500)
经济科学对“再现具体”的追求 ——学习马克思方法论札记·····	周其仁 (506)
附录：其它研究成果选目·····	(517)

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经三十年曲折反复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如何使中国根本摆脱长期落后的状况？如何使国民经济的运行稳步纳入现代化的轨道？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场严峻的考验，也是每一个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时代责任感的中国人不能不思索的问题。

在世界经济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进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人估计，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前40~60年中，农业生产率一般增长了40%左右。^①这表明没有农业部门给国家工业化起步所作的准备，产业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在产业革命之后，农业对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制约作用也十分明显。保罗·贝罗赫计算过十九世纪12个先进国家农业生产率与工业发展的两套数字，发现它们的相关系数为正相关大于0.9，而如果把一个时期的农业发展同下一个时期的工业发展进行比较，这个系数甚至更大一些。在不发达国家，农村人口一般都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这就使得农村的发展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40个不发达国家1950~1970年农业和制造业发展曲线的考察表明，农业的下降和上升，必然导致制造业发生相应的变动。^②可见，在落后国家，没有众多的农村人口的参与，任何经济起飞都是无法想象的。一部分不发达国家无视农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企图跨越阶段去追求片面的工业化的做法，已经给它们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世界经济发展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如果不把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进步放到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来认真对待，就会酿成历史性的重大失误。

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农业发展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状况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仅仅了解世界经济的一般原则，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远远不够的。万千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特殊国情，赋予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进步以更为特殊的决定意义。

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在一个农民占人口80%以上的国度展开的。农民作为中华民族的最大组成部分，农村作为我们国家最广大的领域，不仅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内容。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认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

① 见保罗·贝罗赫：《产业革命和不发达国家》，第75—76，223—224，292—293页。

② 见保罗·贝罗赫：《190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第125、128页。

革命的主要力量。”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①我们党在走上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之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说明：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首先和主要的就是对农民群众的领导；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和主要的，就是与农民运动这个最大的实际相结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开始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农村依然是中国最广大的社会存在，农民依然是革命和建设的最广大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②“使我们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实行了土地改革，并为了满足农民发展生产的需要，成功地领导了合作化运动；而且也正是有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繁荣，我们才完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中国开始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但是，总的说来，在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小农大国，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在和平建设环境里把握国民经济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农村发展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在我国逐步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大工业基础之后，我们的一些同志过高地估计了已经取得的成就，一方面脱离广大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追求一种农民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模式；一方面忽视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和要求，片面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其结果，是我们长期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尽管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也取得了在旧中国无法想象的巨大成就。但是，直至今天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依然处于落后状态，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整个农村所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很少，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没有显著的改善，甚至相当一部分农民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在整个农业生产难以根本解决十亿人口吃饭问题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的劳动不能满足城市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广大农村也不能为城市工业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农业的落后，则决定了被片面突出的工业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良后果，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种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状况如不加以根本改变，我们就无法取得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正如几位老同志精辟指出的：农村的事情没有办好，中国的事情就不可能办好；农民贫困，国家就不能富强；农村停留在古代，中国就无法现代化。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涉及每个中国人根本利益的真理，却经常被人们忽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一种超阶段的战略思想的影响，农民问题一直缺乏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是为了满足工业的需求。整个农村社会进步的全面综合研究，被简化为农业生产的研究；而农业生产的研究，又被人为地局限于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内部的经营管理。“重、轻、农”的经济建设宗旨，收到的是“众轻农”的社会效果。不仅农民想脱离农村，农村干部想脱离农村工作，而且一些农业经济研究工作者也想脱离农业而改行。就是今天，人们一谈改革，也往往首先和主要考虑工业的改革。一系列的事实导致农村问题研究的不合理的畸形状况；农村问题最重要，却最不受人重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3、6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9、79页。

视，农民人数最多，研究农村的人却最少；农村问题牵扯面最广、最复杂，对它的研究却最狭隘、最贫乏。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二十年来我们在农村政策上一系列的失误和不可避免的紊乱。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这种落后状态，是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显然是极不相适应的。

简而言之，在整个世界向现代化加速演进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发展的缓慢及其理论研究的缺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重新开始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艰难历程时，所面临的具体的现实的国情。中国历史的客观进程，为我们提出了时代的课题。它要求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高度提出问题，用一种科学的综合的方法去研究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得出适用于中国的理论、战略和政策。——这就是我们提出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综合研究的依据。

中国农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包含着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每一方面的内容，又包含有不同的层次和诸多的因素。这就要求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层次上开展多方面的研究。但是，多年来我们对农村的研究却相当薄弱，而且存在着许多空白。很多极为重要的学科，如农村社会学、农村教育学，多年中断；很多极为重大的研究课题，诸如农村发展的目标、农村人口和就业等，很少有人重视。已有的学科，研究的也远远不够。更重要的缺陷是，各学科的研究工作，缺乏经常的密切合作，单学科的每一步研究成果，都不能构成有机的理论系统，从而始终使人们不能把握中国农村特大系统内部诸层次、诸因素之间的交叉联系和综合作用。在现代条件下，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各系统、各因素之间的联系日趋复杂，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日益增强，变化速度日益加快，这就迫使人们必须从各系统、各因素急剧变化及其联系上，更深刻地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有效地控制社会运动的进程。在今天的世界上，人们如果不能从总体上把握问题的总和，就不能解决好任何一个局部的个别问题；任何一个学科如果不吸收其它学科的成果来丰富自己，就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如果不综合各个学科的成果，也将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现实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流于一些脱离实际的概念名词之争；另一方面，现实应用的研究，又往往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这样的理论研究难以指导复杂的实践，根据这样研究制定的方针政策难免反复多变。我们的决策者们并非不重视科学的研究与发展，我们各学科的学者们并非不想为国效力。但是，人们发现，当科学家们抱怨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不到重视时，决策者们却正苦于无人提供系统的可供选择的科学方案。究其原因，就在于单学科的研究成果不经过综合研究的转换，无法直接应用于解决问题的实践。在我们的基础理论探讨和应用实施之间，缺少一座战略研究的桥梁。

什么是战略研究？

战略研究的任务是确定中期和长期的总目标，并寻求从可能性到现实性转化的途径。具体到中国农村，战略研究必须探究未来20~30年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不同阶段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途径。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战略研究必须有别于一般理论研究，同时也不同于一般的应用研究。战略研究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中间环节。战略研究的特点不仅在于更具有综合性，而且更具有主观目的性和倾向性。任何战略都必须通过一定

的社会政治力量去实现，都必须体现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我们今天所应研究的农村发展战略，只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农业，繁荣农村的战略。战略研究应当比一般的应用研究考虑到更长远更广泛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各种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一致性，从而体现更长远更广泛的利益。今天的农村发展战略研究，如果不从整个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出发，就不可能提出正确的战略。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从各种学科的角度认识世界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因此，毫无疑问，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应当把农村发展的战略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几十名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岗位而共同有志于研究中国农村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在有关领导部门的帮助下自愿组合起来，为开展中国农村综合研究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和初步尝试。半年以来，我们整理编写了一部分关于中国农村的基础性资料，开始了对中国农村的系统调查，确定了近期研究范围和若干综合性研究专题。但是，要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进行负责的研究，需要更多学科的大批专门人才用新方法结合起来，在共同研究中付出更艰苦的劳动。我们的初步努力，只能说是对中国农村这一复杂的特大系统所作的一次学术侦察。中国农村的繁荣，不仅有待于我国科学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待于全国人民的长期艰苦奋斗。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的起步，正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许多领导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虽然我们的人数不多，能力有限，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所献身的事业，是符合人民和时代的要求的。我们有信心坚持下去。人民和时代要求我们，站在中国农村发展和中华民族振兴的立场上，按照历史发展的要求，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寻求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战略。

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曾经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对人类历史的进步，发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又一次面临新的历史性转折。十亿人口的中国作出正确的选择，必将对人类的未来再次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未来不是宿命的产物，而是人类不断作出选择和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

（原载《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3期）

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讨论会上的讲话

邓 力 群

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

在座的同志中的绝大多数都插过队。插过队，现在进了城，还想到农村，是令人很高兴的事。中国十亿人口，其中有八亿农民，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好象是个常识，但是对这种国情真正认识清楚，并且由此出发去看问题、想问题的人，实在还不很多。你们当过农民，现在还想把自己的学识、能力用于农村的发展，拿你们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这项事业要有一种献身精神。有了这样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觉悟，而且终年累月，切切实实地干下去，证明大家没有辜负党的教育，不愧在这个问题上先进分子。你们就属于我说的还很不多的人中的一部分。我们的事业非常需要大批这样的人。

我十三岁以前在农村，后来到长沙、北京读书，“一二·九”以后到了延安，和农民有点接触。日本投降后，到东北搞了三年半土改。后来到新疆，也在农村呆过一年多时间。1957年、1961年两次到农村做过调查。1964年、1965年又搞过两期“四清”。干校七年，住在农民家。我对农村有所了解，也有感情，听到有同志愿意做农村工作，就觉得和自己心心相印。你们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而且相信你们是可以做到的。

不了解农村，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农村的事没办好，中国的事就不能说办好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讲到这个问题。那里头虽然是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来讲这个问题的，但实际上也是讲农民问题和工人问题。农民多，生产力落后；工人少，但它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个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以至革命以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决定我们的一切战略、策略和一切基本政策的出发点。革命时期是如此，建设时期仍然是如此。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功勋。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确立了这样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即代表工人阶级把中国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进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城市，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把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值得大

书特书的一页。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犯过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走了不少弯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已经大为提高，而且正在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切实有效地纠正和避免发生过去的错误，努力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作为历史的教训，它不仅对我们这一代人，而且对你们这一代人以至以后的人们，都是需要记取的。如果我们能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八亿农民政治上翻身，经济上也翻身，并且越来越好，使农村真正发展成为文明的、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那我们整个国家的面貌就会大为改观。南朝鲜、香港、新加坡没有八亿农民的问题。日本、西欧、美国、苏联几个国家的农民加在一起，也没有八亿。我们把八亿农民的事情真正搞好了，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将有伟大的意义。为了这个事业，是值得把全部精力、全部生命贡献出去的，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的。

一个中国人，眼里没有八亿农民，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很大的缺陷。就青年人来说，有的在农村，但是想方设法要挤到城市里；有的在城市，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们瞧不起农民，眼里、心里都没有我们的八亿农民。而你们眼里、心里是有八亿农民的。尽管你们现在是小人物，没有资望，可是只要真正把自己贡献给八亿农民，那就代表了中国前进的力量，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这样的精神生活是高尚的、丰富的。

是的，我们的农村贫穷落后。毛泽东同志讲“一穷二白”，实际上主要是指八亿农民经济上贫穷，文化上落后。可是另一方面，每一个在农村生活过而又不怀偏见和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承认，我们的农民勤劳朴实、正直善良，有许多可敬可爱的优秀品质。有个电视片叫做《家乡的红叶》，那里有个情节，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民的一种可爱的品质。一个复员军人当了队长，在工作中碰到了障碍。这时接到通知，调他到县武装部工作，他犹豫时，有个女孩子很有志气地对他说：你走就走吧，可是你要想到我们这个地方再穷，也是生你养你的地方。这两句话尽管很普通，我看确实是农民的语言。这个作者很懂得农民。我在干校期间，到西柏坡去参观过。除西柏坡稍微平坦一点，一路都是山区，荒山秃岭，无数块巴掌大小的土地，有的只能种几棵玉米。农民天天上山下山，一块一块地耕耘收获，祖祖辈辈在那种条件下劳动和生活，默默无闻、一点一滴、长年累月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那里的土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这本身就是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样的光辉业绩，就是我们的被一些人看不起的农民们干出来的。

看不起农民，眼睛里没有农民，心里没有农民，这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大健康的情绪。他们既然这样看不起农民，农民也有权忘记他们、抛弃他们！历史上常有这种事情：心里记挂着农民的，为农民服务的，农民就想到他；忘记农民的，不为农民服务的，农民就抛弃他。我们的农民，正因为他们是劳动者，所以作为整体来看，他们不会失去判断谁是他们的真正朋友的能力。真正为农民尽力的，为他们的解放事业献身和作出牺牲的，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将永远记着他们。

现在有人很喜欢讲两代人的“鸿沟”。我看，两代人之间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当然会有区别，但是要真正说“鸿沟”的话，实际上应当是指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们之间的鸿沟。年纪大小在人们之间带来的不同认识，远远不如社会立场在人们之间带来的不同

认识那么严重，那么具有根本的性质。我们跟那些想不到农民、鄙视农民的人之间的鸿沟，确实是很深的。可以说，使这个鸿沟填平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真正同人民站到一起来。我们同你们也是两代人，但是，恰恰在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之间没有鸿沟，而且心心相印。正因为立足于共同事业，所以才会有感情的交融。

第二，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有农村的发展

要使八亿农民比今天生活得更好，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是从大的方面说来，还是必须走他们已经选定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你们研究中国农村的发展，我想也是社会主义道路下的农村发展问题。离开这个道路来谈农村的发展，是不会有希望的。

我想谈一点过去搞土改时看到的情况。吉林榆树县的土地、房屋大量集中于地主。自己有几亩地的贫农很少，人数最多的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雇农，占到农村人口的60~70%。地主占那么多土地、房屋，怎么经营呢？他出租土地，要看你有没有一套马车犁耙，就是三匹马一张犁。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租地的资格。大量的雇农，是连这样的资格也没有的。土改后，贫雇农分到了土地和牲口，可是牲口怎么办呢？你分一个，我分一个，他分一个。一个牲口怎么种地？只好几户凑个互助组，自愿结合，提出了互助合作的要求。要搞生产就必须互助。后来我又到了新疆。那里大部分农牧区还处在封建社会中期，生产落后，生产关系也落后，但是土改以后农牧民也要求互助合作。所以说，搞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共产党强加的，而是农民自己的要求，是社会前进、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说合作化搞错了的人，相当多的是因为不懂事，没有参加土改，没有参加减租反霸，人云亦云。其中也有老干部。但是老干部中间，也有没做过多少农村工作，没到农民中去较长时间的人。说合作社搞得快了一点，工作搞得粗了一点，这是事实。但因此全盘否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定搞合作化，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仔细推敲研究一番，就会看出这不太准确。应该说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包括多方面的内容，需要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完成的任务。包括解决所有制方面的问题，都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要一直延伸到共产主义。按照过去那个提法，好象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基本完成。这样就容易造成急性病，急于过渡嘛。现在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个基础上，今后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就农村来讲，把土地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可以设想，如果土改之后，我们不搞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让私有制长期存在下去，那会怎么样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看到，农村已经发生分化，继续发展下去，分化必然越来越重。中国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土地少人口多。土地私有制不改造，不发生分化才怪哩。我们及时地把个体农民的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土地个人私有变为集体公有，这就避免了分化。这恰恰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的经验。在具体步

骤上，尽管我们也不是没有错误，但从全国范围看，甚至在林彪、“四人帮”为害甚烈的十年动乱期间，公有制也没有公开地大量地退回到私有制去。这个事实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农村，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巨大的生命力，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由衷的热爱和欢迎吗？这难道是光靠共产党下命令能够做到的吗？

至于包产到户，这是争论多年的问题。最早是困难时期安徽提出来的，有的同志立即坚决反对。陈云同志表示，何必那么急急忙忙地反对，让它实验几年再看好不好？现在来看，陈云同志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1962年邓子恢同志派人调查，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比不实行的强得多。自留地最好，包产到户的地次之，不是自留地、又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最差。邓子恢同志说，这是合作化以来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大创造。反对的人说，这不是什么经营管理问题，是方向问题。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批评得更厉害，说主张分田到户的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看就知道他是主张单干的，最危险的是主张包产到户的，名义上在保护合作化，给人觉得他搞得是维护集体化的经营管理，因此带有很大欺骗性。现在越看越清楚，中国农村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保持了土地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搞包产到户，就找到了适合生产力性质、受到农民欢迎、又能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得到巩固和发展的经营管理方式。在这方面，你们已经专门做了调查，是了解不少情况的。很清楚，这种包产到户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包产到户，尽管是大包干，也绝不是分田到户，更不是单干。

耀邦同志最近说，我们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从土地私有制到公有制，是一个很深刻、很伟大的变革。否定八亿农民的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行动，说得客气点是无知，说得挖苦点就是完全看不到八亿农民的行动、八亿农民的思想、八亿农民的觉悟。对广大农民的这种深刻的历史要求，必须肯定。想否定是否定不了的，只能说明自己可笑、幼稚、无知。他还说，我们进行了这种改造以后，在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面，在解决集体经济基础上关于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搞责任制、收益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上，虽然也不断地摸索，但是长期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而且犯了很多错误。只有到了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上了路。

现在，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各地农村都有很多新创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我们的集体经济就更加巩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能更好地发挥。有人攻击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特别是抓住包产到户大做文章。应当承认，在这点上，我们的宣传工作确实有缺点，就是没有讲清楚包产到户是公有制基础上经营管理方面的创造。你讲包产到户这样好、那样好，公有制一字不提，人家当然要讲你是单干嘛。

还要看到，包产到户以后，出现了新的生产联合、专业分工。宋平同志讲，甘肃一向很穷，搞包产到户比较早，搞起来以后，自然地产生了一种生产上进行分工和联合的需要。有个生产队有台电磨，包产到户后，有人提议把电磨卖掉，每家分几个钱。一讨论，多数人不同意卖，电磨留下了。经营管理有了一点改善，挣了点钱。有人又提议把钱分掉。多数人主张再买一台电磨。增加了电磨，又需要增加几个人。这不是分化出几个劳动力去搞电磨了吗？挣的钱多了，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也分给社员一些，使家家增加了收入。包产到户以后，羊增加了，各家自己放，很不方便。有人提出干脆把

羊凑到一起，搞个劳动力专门放羊。这样，不是又有劳动力去干这件事了吗？地也可以由几个主要劳动力带着各家的辅助劳力种起来，其他人搞点别的副业。这说明，实行包产到户后，由于分工的要求、专业化的要求，各种新形式的联合开始产生了。去年，吴象同志到几个原先很穷的地方，也看到这种情况。你们出去调查，在这方面都会增长很多见识。包产到户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它是不会停滞、凝固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出来之后，生产发展之后，专业化分工和联合是必然要提出来的要求。

关于包产到户，一条，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经营管理方面的创造；另一条，它促进新的专业化分工和联合。从事实出发，把这两条讲清楚，就可以说服更多的人，打消怀疑者的顾虑，驳倒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同时，也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深化我们的认识，才能使党的政策进一步贯彻下去，真正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只就包产到户一种经营管理方式而言。

现在全国各地农村，在专业分工、联产奖励、联产到劳等方面，形式是很多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我们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没有错，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会错。决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丝毫动摇。当然，极个别地区，十里、八里才有一户人家，硬让人家联也联不起来，勉强去联，实在劳民伤财，农民不欢迎，生产也受妨碍。这类个别地方，中央的政策允许单干。它数量很小，不会影响我们社会的性质，不会影响我们的根本方向。研究农村问题、农业发展问题，一定要坚持这样一个根本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站稳脚跟，明确方向，然后稳步前进。

第三，把农村发展的问题当做科学来研究

你们提出，要使自己的工作服务于八亿农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想法很好。你们拟定的题目和准备采取的步骤，我也赞成。

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他曾经根据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那种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指出它的特征：“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随着历史的前进，生产发展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本身显露出来了，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充分表现出来了，历史才给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一种条件，就是不需要用臆想的联系去代替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了。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与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的变化相适应了，“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我恳切地希望，你们的研究工作，能够坚持这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经过三中全会以来两年多的工作，过去在“左”的束缚下被压抑着的正确的东西，得到了解放，过去做错了的事情，现在总结了经验，也知道该怎么去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天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那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林彪、“四人帮”压抑真正的新生事物。这两年，真正的新生事物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到处涌现出来。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耕作习惯，不同的行业，都有各式各样的创造。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充分地去发现广大农民、广大农村干部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创造出的大批新鲜事物，从中总结经验。书是要看的，脑子是要想的，要有思维活动，要有抽象推理，这都没有问题；但基本点一定要建立在发现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发现有生命力的新鲜事物上。

据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几个同志，过去一段时间对包产到户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这当然好。但是我劝你们不要只盯在这么一件事情上。一方面，这件事情还要更深入地调查研究；另一方面，一定要放开眼界走遍全中国。当然要有分工，有侧重。要多到一些地方，普遍而深入地了解农民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愿望。不要以为农民落后就没有创造，不要以为农民穷就安于穷。如果说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有创造，八亿农民没有创造，那同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有点差不多了。

外国的经验值得借鉴。毛泽东同志就提倡古今中外进行比较。外国人的情况和观点要了解，但是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有批判地加以吸收。这虽然是老话，但真正要学会运用这个方法，确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是靠偷懒能够做到的。你们最近很勤恳，这是很好的。但也不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就能做到的，而是必须一辈子坚持下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了解了，什么都掌握了，一定要虚怀若谷。要坚定地相信，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来自人民，农村问题方面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必然来自八亿农民。我们是要帮助农民的，我们也负有教育农民的责任，但首先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要把他们的东西加以总结提高，这里头就有我们的用武之地。要勤勤恳恳地把八亿农民创造的东西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加以整理，加以提高。发现事物的客观联系是不容易的。但是只发现还不等于已经成为科学了。发现了，要成为科学，还要上升为规律。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恩格斯说得好，要善于使用概念，要善于抽象，要善于理解。比如《资本论》，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看了很多很多书，其中不少白皮书之类的书。没有那些书，没有那些材料，他写不成《资本论》。可是把那些东西堆在一起，是不是就有了《资本论》呢？那就不是《资本论》，而是白皮书的汇集而已。所以在这点上，我也希望同志们真正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确有创造，确有发明，确有概括，确有提高。

善于思维，善于抽象，两件都不容易，但是，“有志者事竟成”。归根到底，你们是有希望的。说得再乐观一点，在我去见马克思之前，可以看见从你们中间出现一批全心全意为八亿农民服务的农业科学家、农村经济学家。我再活十年吧，象你们这股劲干下去，十年就可以成为有学问的人。

搞一个农业战略规划，已经提上党和国家领导的议程。究竟我们十年内农业应该如何发展？二十年后农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要有个长期规划，这个规划一定要科学，要实际，确实能够使我们的八亿农民在几十年内为世界下一篇光辉灿烂的历史，把我们的

农村、我们的农业发展的历史载入史册。实现这一点，我们这样年纪的人也许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就要开始制定这样一个规划。

中国农村的情况非常复杂，地域很辽阔，各个地区不同，人口又这么多，需要大家努力去找各种办法。你们的调查研究，要适应这个规划制定的需要，紧紧地同规划的制定和实现配合起来。希望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做出自己的努力，贡献出自己的才智。

（原载《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3期）